

漫长的革命

THE LONG REVOLUTION

「美」埃德加·斯诺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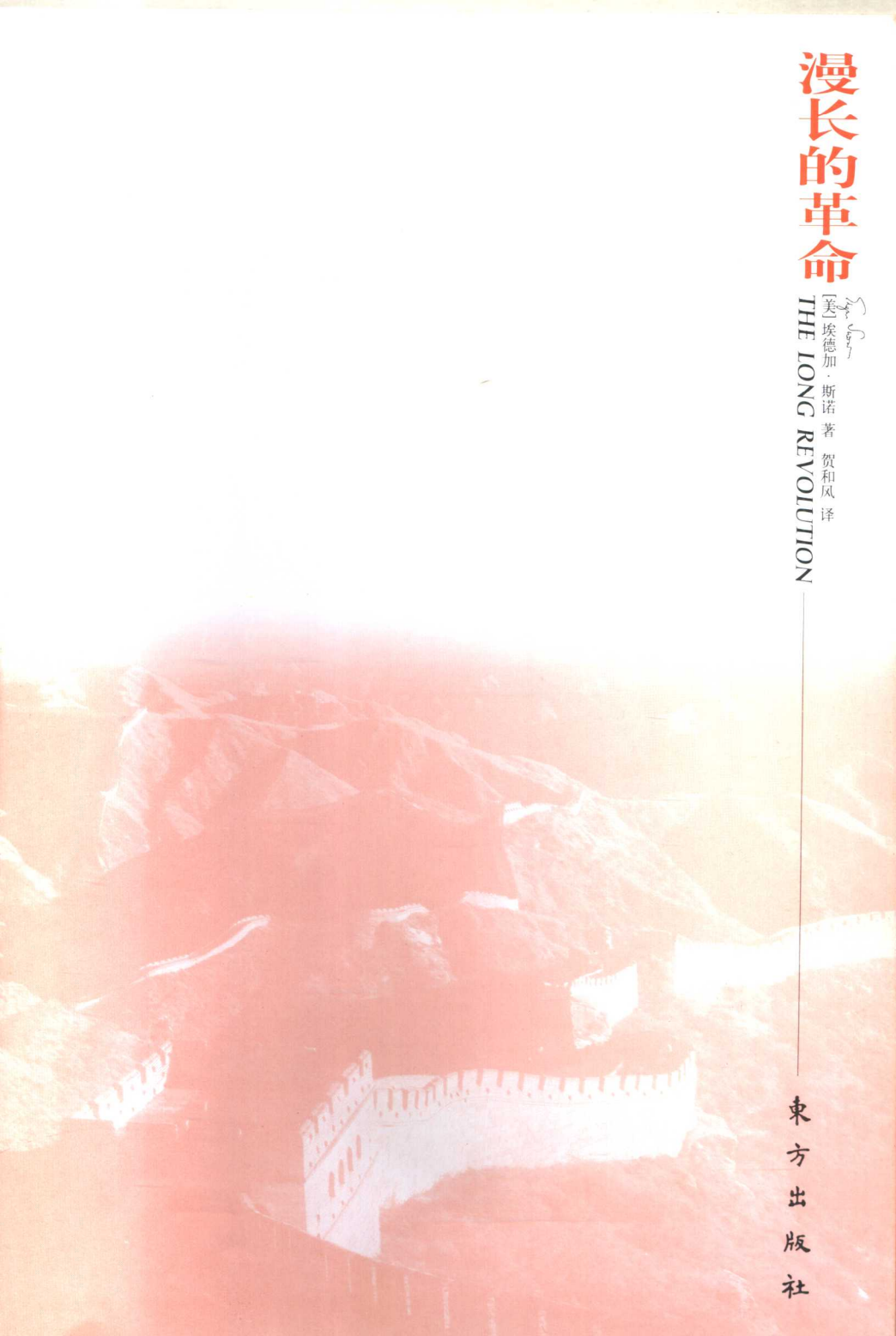
東方出版社

漫长的革命

Eric S. Stein
[美] 埃德加·斯诺 著 贺和风 译

THE LONG REVOLUTION

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邓仁娥

装帧设计:曹春

Snow, Edgar, 1905—1972.

The long revolution. [monograph]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漫长的革命/[美]爱德加·斯诺著 贺和风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11

(红色档案丛书)

ISBN 7-5060-2354-7

I. 漫… II. ①斯… ②贺… III. ①史料 ②社会—评论—中国—
1960~1970 IV. ①D652 ②D60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9496 号

漫长的革命

MANCHANG DE GEMING

[美]爱德加·斯诺著 贺和风译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京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7.75

字数:168 千字

ISBN 7-5060-2354-7 定价:1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此书谨献给

精心治疗和照护了我丈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医生和护士们

献给

赋予我丈夫爱与关心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

洛伊丝·惠勒·斯诺

原出版者的话

1971年，埃德加·斯诺最后一次访华后返回了美国。1972年2月15日，他遽然长逝。如果他活着，他肯定会给《西行漫记》和《今日红色中国：大河彼岸》的新版本添加注释和参考文献，为读者奉献更多的历史事实。他肯定会根据自己的记录，增加1970—1971年他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谈话的内容。

埃德加·斯诺的妻子洛伊丝·惠勒·斯诺在同意出版《漫长的革命》一书的信中写道：“这是一本没有完成的著作——我的丈夫刚刚开了个头，便出乎意料地离去了。书中播撒下了中美两国人民新关系的种子。在我们的培育下，它们将会成长壮大。”

目 录

第一编 不同的国度？

- 1. 天安门上见面 3
- 2. 周总理的暗示 6
- 3. “文化大革命”的实质 12
- 4. 局外的公民王某 21

第二编 医疗保健与人口控制

- 5. 针刺麻醉堕胎 29
- 6. 针刺疗法是什么？ 33
- 7. 性与人口统计 40
- 8. 例外的情况 48
- 9. “把重点放到农村去” 52

第三编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10. 个人崇拜降温 61
- 11. 文化 68
- 12. 宣传的阴谋 76

13. 公开战争 83

第四编 军队、党和人民

14. 军事专政 93
15. “为人民服务” 100
16. 作为建设者的军队 105
17. 爱丽丝在南泥湾 111
18. 军队和人民 121

第五编 人民公社

19. 起点 131
20. 令人动情的旅程 134
21. 富人和穷人 139
22. 回顾与展望 141

第六编 与总理彻夜长谈

23. 周恩来与敞开大门 147

第七编 与主席共进早餐

24. 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 159

第八编 尼克松要去紫禁城

25. 强势地位	169
附录一 山南海北：1965年1月9日与毛泽东主席的 谈话	178
附录二 1964年与周恩来的两次谈话	208
索 引	220

第一编

不同的国度？

1. 天安门上见面

那是10月里的一个朗朗晴日，北京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21周年庆典。我坐在天安门城楼上，拥挤的人群中没有人注意到我。我感到有人在拉我的袖子，我转过头去，看到那是周恩来总理。他很快把我和我的妻子洛伊丝带到毛主席的身边，我们在那里站了一段时间。那个位置是占世界人口1/4（或1/5？）的中国的中心。中国领导人的公开举动总是有目的的。一定是发生了重大的事情，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城楼下是可以容纳50万人的宽大广场，广场的对面树立着一座巨大的标语牌，牌上写着毛泽东1970年5月20日声明的摘录，巨大的字体一个街区以外仍历历可见。树立这样的标语牌是要宣告，中国坚决支持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反对朗诺的政变，反对朗诺的美国盟友，坚决支持新成立的印度支那人民反美联盟。为了突出这一点，西哈努克亲王也站在那个中心的位置，站在主席的另一边。亲王面带微笑（他喜欢微笑），我的妻子告诉他，反对入侵柬埔寨的美国人不是只有我们两个，他热情地回应说，“美国人民是我们的朋友！”

毛的号召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中国的宣传语汇中，走狗的意思就是奴性十足的帮凶。

后来，《人民日报》在毛主席77岁寿辰那天刊登了我们在

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对我的称呼是“美国友好人士”。当天的报纸在右上角，也就是每天刊登毛语录的地方，登载的语录是：“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

毛主席尽力把人民同政府和政府的政策区分开来。如果这样做需要一个象征的人物，我愿意成为这个象征的人物：即代表众多的反对武装侵略和毁坏越南和其他印度支那国家的美国人。我在那里接受的，是向终于终结了马修·李奇微将军预言的“悲剧性重大错误”的美国反战者的致敬吗？是的，我接受的就是那样的致敬，但不仅仅是那样的致敬……

外国的报纸曾谣传，毛的手麻痹了，所以始终把手掩在袖子里，但是我注意到了，他握手时像以前一样有力。他比1965年我上一次见到他时消瘦了一些，看起来更健康了。我现在才知道，那时，他作为革命领袖，正在作出可能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和最大胆的决定。这个决定就是清洗他的由党选定的接班人、党的副主席和国家主席刘少奇，以及党内其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他们的一切走狗），他们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对象。

在我们观看精巧的彩车和活报车游行时，毛向我简要地谈了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游行组织得太好了！服饰的色彩和样式与工人和知识分子平时所穿衣服的单调形成鲜明的对照。游行队伍里有中国大部分少数民族的身影，中国大约有47个少数民族，他们讲的语言超过20种，他们的人口占总人口的5%或6%——中国目前的人口在7.5亿到8亿之间。今天的主题是生产和战备，蓝色和灰色的制服随处可见，但是，除了持枪的年轻民兵（有男孩也有梳马尾辫的女孩）之外，没有其他什么武器。

按次序行进的彩车装点的，是人们在公社、工厂、文化和军事生活中遵从的毛主席著作、语录和指示。最壮观的彩车上展示的是：火车模型奔驰在布满隧道和桥梁的崇山峻岭之中，它象征着最遥远的新疆和南部的中越边境已经完全贯通。全身和半身塑像比比皆是，其中不乏巨大的塑像，塑造的就是站在我身边的这个顶天立地的人物。他就是第二次解放，或者说是文化解放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这个运动的目标是保持革命的纯洁性，是使空前广泛的群众投身于其中。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城楼下人们齐声呼喊口号，许多人，不仅仅是年轻人，热泪盈眶。

“您怎么看这个游行？”我一边向满怀崇敬之意的游行者们挥手，一边忍不住问道。“它给人怎样的感受？”

毛面露嗔色，摇了摇头，说：情况有所好转，但他并不满意。他还没有来得及回答，我们的谈话就被后面的游行队伍打断了。几个星期之后，我才在一次长谈中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也就是在那次长谈中，他相当坦率地谈到了个人崇拜的“讨嫌”。但我发现他在10月1日那天想的，不是人们用来拼组毛主席语录的场面、彩旗和鲜花。他想的是重建党和国家上层建筑的问题，是恢复文化大革命剧变期间丧失的生产节奏的问题，是促进越南战争结束和扩大中国与外部世界接触的问题。他还考虑了同理查德·尼克松进行对话的可能性的问题了吗？

他问我，美国是否也有造反的情况。他对美国的反战运动印象深刻（他在5月20日的声明中赞许了美国的反战运动），他希望对美国反战运动的政治意义做更深入的了解。他说，我们很快会再次会面。

2. 周总理的暗示

第一次国共内战期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部分时间里，我曾在中国生活和工作过。^① 1960年我终于能够重返中国，1964—1965年我再次来到中国。而这次来华是在1970年。我的妻子洛伊丝·惠勒是个演员，她以前从未到过中国，尽管她获得了与我同行的签证。但是前几次来华，美国国务院都以“不符合国家利益”为由，拒绝她访华，护照不“生效”。这次来华，她没有等待华盛顿的许可。

1960年和1965年，我两次访华的护照，也是在我的出版商对华盛顿高层施加压力之后，才得以“生效”的。我随后提交的报告当然也就被华盛顿的高层置诸一边。这10年间，我没能用些许有用的信息影响傲慢的决策集团，约翰·肯尼迪也很快忘记了他在1963年就职演说中说过的话，他没能在总统任期内把握“同中国开展新关系”的机遇，反而使我们身陷越南的丛林。这10年间的故事我已另文叙述。^②

洛伊丝是为数不多的进入过人民共和国的美国女性中的一员，此时此刻，她就站在我的身边，用她那机敏的双眼弥补我

① 作为记者，见 *Journey to the Beginning*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57; Vintage Books, 1972)。

② 见 *Red China Today: 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62; Vintage Books, 1971)。

观察的不足。我们到达北京的时间是8月上旬，适逢北京人所说的秋老虎季节，但大片的树阴和周边地区的造林工程，多少缓解了一些炎热。

自从文化大革命初期以来，几乎没有任何外国人，包括以前就住在北京的外国同情者，曾经获准到北京以外的地区旅行。^①以前的例行旅游胜地（长城、十三陵、西山，甚至北京大型的博物馆和宫殿）已不再向游人开放。我和洛伊丝在这些地方的旧地重游，燃起了北京的外交官和外国居民的希望：“最紧张的时期”即将结束，他们的希望是正确的。

在我所熟悉的两所大学度过了整整一个星期，一所是我曾经执教过的燕京大学；一所是燕京大学附近的清华大学，那是一所著名的工科大学。我们在那里听取了对几年来文化斗争和大学巨大变动的介绍，听取了关于红卫兵的故事和后来发生的故事。我们参观了现代化的农村医院，参观了一座机车车辆厂、一座钢铁厂，听取了关于文化大革命其他方面的情况。其后，我们乘飞机飞往地处西北的陕西省，从省会西安前往著名的战时游击之都延安。我们继续西行到保安（今志丹）县——我们是1945年以来第一批到那里的外国人——深入到1936年我第一次会见毛泽东的群山之中。那时的毛泽东还是一个被通缉的“赤匪”^②。我们参观了一座由军队和政治改造学校共同管理的国营农场，西安市的一位前市委书记带领我们

① 新西兰人路易·艾黎是一个例外。他是我在北京最年长的外国朋友，他可能是中国历史上走过的地方最多的人。他不久将要出版一部记述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旅行的著作。

② 见 *Red Star Over China*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37; rev. Ed., Grove Press, New York, 1968, 1971)。

参观了现在由他负责管理的养猪场。其后，返回西安，再返回北京，看了多场演出，多次与老朋友聚餐晤谈，然后飞跃长城，去了东北。在参观了多所企业、一座由军队针灸医生管理的聋哑学校和巨大的鞍山钢铁公司之后，我们南下广州参观了广州商品交易会。然后，我们再次北上，去了东部沿海的茶叶产区浙江，去了上海和长江下游地区，参观了许多人民公社，看到许多友好的人。

在我2月离开中国之前的6个月里，我一共参观了11个人民公社，这使我在过去的10年里参观的公社总数达到33个，这些公社遍及中国各地，而我所到之处都受到了人们的欢迎。现在，到处是碧绿的农田、平整的梯田、茂密的树木，与毛泽东多年前的花园国家的愿望更加接近了。我们是多年来首次造访的西方人，所到之处，每每引来大批围观者惊愕的目光。当然，那还是乒乓外交开展前几个月的事情。

周总理欢迎我回到中国的第一项活动，观看乒乓球比赛。

那是1970年8月18日。我们接到观看北朝鲜与中国乒乓球队比赛的邀请，但由于事先已有晚餐约会，我们谢绝了邀请。晚餐吃到一半时，我的朋友姚伟（此前，我和他有诸多共事的经历^①）打来电话，只有简单的一句话：“准备出门”。我猜测要见我的人可能是总理，结果不出所料。我们在乒乓球馆（一座有18000个座位的漂亮新建筑）见到了他，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年逾80的（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西哈努克亲王和他的迷人的妻子、总参谋长黄永胜、副总理李先念，以及其他著名人士。

^① 见 *Red China Today*, op. cit.

我们到达后不久，周总理离座而去，没过多会儿，有人把我们带到了一间会客室，总理正在那里等候我们。周穿着短袖运动衫、灰色的裤子，脚下是白短袜和凉鞋，他已 72 岁，银发也依稀可见，但仍然像以往一样机敏。他亲切地向我问好，同我讨论我的旅行计划，话题很快转入政治问题。（通讯员不断地向他报告比赛的比分，这样，在比赛结束时他就可以出现在赛场，那时就是比赛的高潮，中国的领导人和他们的客人要走进赛场，向运动员握手祝贺并与他们照相留念。）

总理问了很多关于美国的问题，这使我想，他是不是认为美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已经严重到“无法在亚洲发起新的重大军事行动”。他把这个问题推回来，让我自己回答，但他提醒我说，中国的第二个威胁在北方——苏联在边境陈兵百万。

“如果中国谋求缓和，”我问道，“与俄国谈判还是与美国谈判可能会更好？”

“这是我一直问自己的问题。”他回答说。

这时，乒乓球比赛已接近尾声，总理说我们下次见面再谈我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喝完了咖啡，我们就起身去同比赛的双方握手去了。

10月1日，我与总理有过短暂的会面，那时他说，美国人曾提出重开中美会谈，但中国不感兴趣。后来我把一些问题留给他。11月5日，也就是我回到北京以后，他给了我四个小时的采访时间，我们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谈到了各种各样的话题。像以往一样，总理总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谈，但他最引人注目的话题，是在北京举行中美会谈的可能性。